

王国维致张尔田函考释

刘 波

内容摘要:新发现的 1923 年 8 月 14 日王国维致张尔田函,内容涉及当年初夏王国维北上担任逊清朝廷南书房行走之初的生活、任职、交游与学术等情况,有助于王国维生平与思想研究。

关键词:王国维 张尔田 信札

近期,我在整理赵万里(1905—1980)信札资料时,见到一通王国维(1877—1927)致张尔田(1874—1945)函。赵万里是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助教,王国维逝世以后,“所有书籍、遗作都是他处理的”^①,编有《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并参与罗振玉发起的《海宁王忠愍公遗书》编辑事务,后来另与王国华(1886—1979)合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4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为搜罗王国维遗墨,赵万里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 3 卷第 1 号(1929 年 7 月)、《图书馆学季刊》第 3 卷第 1、2 期合刊(1929 年)分别刊登《征求王静安先生遗文手札启事》,谓“现因重订先师王静安先生年谱及完成《观堂别集》,深惧遗漏,凡海内外学人与先生有旧,藏有题跋手札,不论已刊未刊,恳求借钞或惠借,均所盼祷”^②。这则启事是否得到广泛响应,目前没有看到相关记述,不过它至少表明,赵万里曾设法多方搜集王国维遗文手札。

张尔田 1930 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此后居留北平直至去世。1931 年张尔田整理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时,曾从赵万里处借阅赵临王国维校本《钦定蒙古源流》,从中摘取王国维校语补入该书,并在赵临王校本之前撰写跋文一则^③。可见赵万里与张尔田在 1930 年代前后有一定交往,此函可能便是那一时期赵万里从张尔田处获得的。

①王东明著,李秋月整理:《王国维家事》,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68 页。

②赵万里:《征求王静安先生遗文手札启事》,《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 3 卷第 1 号(1929 年 7 月),内封页。

③赵万里临校本今存赵府,承赵深先生惠示,谨致谢忱。

信函全文如下(图见封二):

孟劬吾兄有道:别后忽忽两月,比想起居胜常为颂。此间夏令尚不甚热。弟于五月迁入后门织染局新居,家眷未来,屋多人少,于销夏为宜(上房甚高敞,现以上房作书房,颇适)。暑中无可消遣,颇作金石题跋。近三四日内成《魏石经续考》一卷,缘今岁所出魏石经合诸残石小片共得二千字许,比宋人所见乃踰倍也。弟在此应酬稍夥,此间可谈考据学者有之,至可与谈胸臆者则其人甚不易得,故辄思兄来此。然大学下半年事全不可知,恐兄亦不易命驾也。沪上诸公不甚知此间情形,如通书则书不胜书。而沪上恒喜以书传观,又恐不免多生是非,故辄不敢通书于诸老。然弟上月却有一文字,论西方学术执一之害,并现在自处之道,中间甚费周折,乃得上达,亦聊尽寸心,不敢云有所补益,然不敢以告沪上诸公也。敝眷月内可北来。益庵、孟莘诸君想常晤。凤老近注《谷梁》,不知如何下笔。又劝弟注《尚书》,此却较《谷梁》有生发也。近来颇思学《易》,拟专读经文,不作他种交涉,兄谓如何?专肃,即请道安。不一。弟维再拜。初三日夕。

此函信封尚存,题:“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同益里九号张孟劬先生台启。北京织染局十号寄。税足。”北京邮戳日期为“十二年八月十五”,即1923年农历七月初四。此函末署“初三日”,可知其撰写时间为1923年8月14日。

张尔田为王国维好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举人,清末历官刑部主事、知县、候补知府。1904年王国维任教于苏州师范学校时期,便与张尔田结识。1914年张尔田任清史馆纂修。1915年,浙江省纂修《浙江通志》,总纂沈曾植(1850—1922)邀王国维、张尔田二人参与编修。

1916年王国维自日本归国,寓居上海,与张尔田及其好友孙德谦(1873—1935,字益庵)交往甚密,沈曾植称之为“海上三君”^①,又有诗赞曰:“三客两州既文博,百家九部共然疑。”^②王国维自谓:“丙辰春,余自日本归上海,居松江之涓,闭门读书,自病孤陋。所从论学者除一二老辈外,同辈惟旧友钱塘张君孟劬,又从孟劬交元和孙君益庵,所居距余居半里而近,故时相过从。”^③张尔田亦谓:“三人者无十日不见,见则上下古今,纵谭忘晷。”^④王国维此函则称:“此间可谈考据学者有之,至可与谈胸臆者则其人甚不易得,故辄思兄来此。”以张

①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载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王遽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载《民国人物碑传集》,第547页;罗继祖:《“海上三君”》,《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第214页。

②沈曾植:《题蒋孟莘乐庵写书图》,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1366页。

③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载《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64页。

④张尔田:《孙隘堪所著书序》,载《太史公书义法》,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影印本。

尔田为“可与谈胸臆者”，交谊可谓深厚。罗继祖曾据王国维致罗振玉函中对二人的点评，认为王国维“由于治学途术不同”，“于孙张交本落落”^①，恐怕有商榷的余地。

张尔田 1920 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2 年因病回沪，但依然是北大在册教员，因此王国维有“辄思兄来此”的想法。此函所称“大学”，指的便是北京大学。1923 年 12 月 11 日北京大学注册部发布公告称，“张尔田先生因病未能来校，所授国文系各种功课本学期暂停”^②，果然如王国维所言“不易命驾”。此函“全不可知”一句，隐隐透露张尔田与北大之间似有龃龉。

司法部街东华银行，即金梁（1878—1962，字息侯）寓所。王国维初至京师，选择入住金宅，主要是为了避免与北京大学发生更密切的关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初，岁在己未，夏，北京大学文科拟聘先生为教授，倩先生友人鄞县马叔平（衡）先生为先容，先生却之。庚申，又提前请，先生仍以不能北来为辞。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③己未即 1919 年。可知北京大学前后费时三年，方聘得王国维为通信导师，且他本人并不情愿。

此次北上时，王国维受聘北大通信导师已有年余，然而内心的抵触情绪仍然强烈，这在住宅选择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在 1923 年 5 月 7 日致函罗振玉，谈寻觅住宅事：“前日息侯致一山书，属维与子勤入都，可暂寓伊处。维颇虑大学中人出为照料，致多不便，若舍馆一定，则一切可以婉谢，故颇思以暂在息侯处下榻为宜。一则可与此辈远隔，一则将来觅寓亦属自由，想公意亦然。”^④5 月 9 日致罗振玉函又谓：“寓所所以暂拟息侯处者，因恐大学中人欢迎，筹办既有所主，则不致有争（暂住数日，则择地均自由矣）。”^⑤可谓避之唯恐不及。

王国维在金宅居住为期一个月^⑥，于 6 月 29 日（农历五月十六）^⑦迁至地安门内织染局十号，新居有“屋二十间”^⑧，此函称“弟于五月迁入后门织染局

①罗继祖：《“海上三君”》，《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4 期，第 214 页。

②《注册部公告（三）》，《北京大学日刊》第 1362 号（1923.12.11）。

③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赵万里文集》第一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第 48—49 页。

④《王国维全集》第 15 卷，第 543 页。

⑤《王国维全集》第 15 卷，第 545 页。

⑥金梁《王忠愍公殉节记》称“公癸亥夏奉召入都，寓余处数月”（载《王国维全集》第 20 卷，第 220 页），略有夸饰。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谓王国维北上之初“寓户部街金息侯少府（梁）家”，又谓“八月，眷属来京，赁宅于地安门内织染局”，均不确。

⑦王国维 7 月 4 日致蒋汝藻函谓“弟于十六日已迁至后门内织染局十号新租之屋”（《王国维全集》第 15 卷，第 720 页），7 月 1 日致王文焘函谓“弟已于前日迁至织染局十号”（《王国维全集》第 15 卷，第 601 页），可知迁居时间为 6 月 29 日。

⑧《致蒋汝藻（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王国维全集》第 15 卷，第 720 页。

新居”，与其他资料恰可印证。家眷则迟至9月中上旬方才抵京^①，因此有两个多月时间，王国维独自居住。“屋多人少，于销夏为宜”，此之谓也。

南书房行走的职务，似乎并不被逊清朝廷看重。王国维6月初觐见溥仪之后，因入直问题与同僚意见不合。6月7日他给罗振玉写信，详谈事情经过：“维谢恩时，奉每日进来入值之谕（子勤亦奉常常进来之谕），即出与二傅及瑞老言之。而三老均不在意，仍谓俟温到再定入直办法。午后往访弢老决此事，不值。次早因即入内，而南斋斋宫监等似以此举为多事（因素无人到）。告以面谕，则谓指将来言之。出神武门时正遇朱傅下轿，告以遵谕进内而同列皆未来，不入则违谕，入则无所事事，请示办法。朱亦谓面谕系指将来言之，现可不必进内，维即请其代奏明此事。维思面谕之意或当如朱傅所说，如仍日日往南斋，则与二傅及同列间感情必大生阻隔，故自昨日后即不复往，往亦无所事也（鸣九、子勤皆不往）。”^②逊清朝廷的官僚们，完全不以“上谕”为意，入直办法久拖不决，两个多月后方才略有眉目。王国维8月15日致罗振玉函谓：“南斋入值办法，前日语紫阳^③。紫阳已发表意见，不以分书为然，但以每人所长者上闻，由上随意发问，即亦闲谈一切，亦无不可。盖即以此意定局也。上体小有不适，系肝象不和，故尚须数日后请旨，恐入值亦须略迟十日耳。”^④也就是说，到撰写此函的8月中旬，王国维到京已两个半月，仍未“入直”；如此函所言，这期间王国维呈给溥仪的奏疏，“中间甚费周折”，才得以“上达”。

与逊清朝廷的沉沉暮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王国维本人的积极进取。他“感恩遇，再上封事，得旨褒许”^⑤。此函所称“上月却有一文字，论西方学术执一之害，并现在自处之道”，即所上“封事”之一。这篇“文字”便是《论政学疏》。罗振玉称，王国维疏稿均已“手自焚毁”^⑥，《论政学疏》因呈上之前曾与罗振玉商榷，其稿幸而保存了下来。罗振玉没有将这篇疏稿直接收入《海宁王忠愍公遗书》，而是另撰《王忠愍公别传》一文^⑦，以全文引述方式发表。王国维呈上的正式文本可能与疏稿有所不同，但其主体内容应当是一致的。

罗振玉引述《论政学疏》稿，未注明撰作时间，据此函“上月却有一文字”一句，可知其撰成呈上时间约为1923年7、8月间（农历六月），上距抵京供职约两个月。当入直办法尚未确定之时，王国维“甚费周折”地上这么一道奏折，其忠于职守可略见一斑。同时也可见他对逊清朝廷的状况满怀忧虑，希望从思

①王国维8月8日致蒋汝藻函称：“敝眷仍拟令于七月杪入都。”（《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24页）此函也说：“敝眷月内可北来。”可相互印证。

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46—547页。

③以朱熹号紫阳借指朱益藩，即6月7日函所见“朱傅”。

④《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49页。

⑤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载《王国维全集》第20卷《附录》，第230页。

⑥罗振玉：《王忠愍公别传》，载《王国维全集》第20卷《附录》，第234页。

⑦原载《海宁王忠愍公遗书》，收入《王国维全集》第20卷《附录》，第234—236页。

想上加以根本改变。他在7月1日致王文焘函中谈及溥仪指挥抢救建福宫失火事,并说:“主上英明,外间所传(殊如容甫之言为甚)颇非事实,但有君无臣,此为可惜。”^①经过短暂的接触,他甚至对溥仪颇有信心,而对同僚则非常不满。这种看法在8月9日致刘承幹函中有更明确的表达:“今日所最亟需者,孟子所谓‘能格君心’之‘大人’,然当世诟有其人?有亦何从进身为近臣?丝毫无所补益,徒呼负负而已。”^②与因循麻木的同僚们不同,王国维本人感于“恩遇”,立意做“能格君心”的“大人”,这也是他上疏论“自处之道”的宗旨所在。此函称这道奏折“不敢以告沪上诸公”,应在前文所谓“谈胸臆”之列。

北上之后,王国维很少与上海友人通信,告知逊清朝廷的现状与自己的遭遇。他在8月9日致刘承幹函中说:“弟自入都以后,对沪上诸友书问甚疏,缘里边情形千条万绪,无从说起。即如今春内务府改革一事,主其事者固不免鲁莽灭裂,而阻挠者心事更不堪问,遂因内讧以招外侮。”^③王国维看到逊清朝廷的腐朽与混乱,有难言之苦。此函也解释了两个原因,其一是“书不胜书”,指小朝廷事务错综复杂(亦即“千条万绪,无从说起”);其二为“沪上恒喜以书传观,又恐不免多生是非”,则表达了对舆论失实的担忧。所谓“沪上”,指的是上海遗老群体。从“恒喜以书传观”一句,也可略窥遗老们交游生活之一斑。

种种无奈之外,可为寄托的便是学问了。此函提及不少学术问题或学界动态,试胪列如下:

其一为“暑中无可消遣,颇作金石题跋”。王国维该年夏所作金石题跋,共有三则:《颂壶跋》,末署“癸亥夏中伏”^④,查当年中伏为7月26至8月5日;《梁伯戈跋》,谓“今雪堂参事特为精拓此本,殆字字清晰,癸亥夏日携至京师,特装此幅”,末署“六月十九日”^⑤,即8月1日;《唐贤力苾伽公主墓志跋》,末署“癸亥长夏记于京师履道坊北之寓庐”^⑥。

其二为“近三四日内成《魏石经续考》一卷”。当年春,王国维获得洛阳所出魏三体石经存字千余一残石的拓本。他在5月4日致罗振玉函提到“魏石经竟得见二石,快甚”^⑦,5月11日便将这一消息告知神田喜一郎^⑧。北上之后,从徐森玉(1881—1971)、马衡(1881—1955)等友人处见到更多残石拓本,视为

①《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601页。

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613页。

③《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613页。

④原载《观堂别集》卷二第六叶;此从《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464页。

⑤原载《观堂别集》卷二第十二叶;此从《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466页。

⑥原载《观堂别集》卷二第二十叶;此从《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461页。

⑦《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44页。

⑧《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66页。

“近来一最快意事”^①，与友人们的函札商榷也更为频繁^②。《魏石经续考》王国维自序对此书撰写经过有详细记述：“癸亥春，乃闻洛阳复出魏石经残石一，两面分刻《尚书·无逸》、《君奭》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数至千馀。三月中，始得拓本，则已剖而为二。又见《尚书·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馀字。比四月，予来京师，则见残小石拓本至多……总今日所有残石，凡得二千有数字，除磨灭不可见者，尚二千字，视五代宋初人所见拓本，字已逾倍，乃复为此考，以补前考之未备焉。”^③

《魏石经续考》成书的新闻，王国维曾写信告知多位友人，如8月15日致罗振玉函谓“近作《魏石经续考》，昨日始成，尚未写清本”^④，8月23日致蒋汝藻函谓“近十日内成《魏石经续考》一卷，秋凉以后当修整”^⑤，都将此书初稿撰成时间指向8月中旬前段，可以互证。

其三为“风老近注《谷梁》”。风老即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时任清史馆总纂兼代馆长。柯劭忞所著《春秋谷梁传注》，以宋氏《春秋注》“九旨”为全书纲领，“复取本传之文，参互旁证，以究其未备”^⑥。其弟子牟润孙谓“自来说《谷梁》者，殆未之有也，诚足与《左传》杜注、《公羊》何解方驾矣”^⑦，评价颇高^⑧。该书有1927年铅印本，1935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编印“柯劭忞先生遗著”三种，以该书为第一种^⑨。

其四，关于经学方面某些问题的看法。此函评论柯劭忞注《谷梁》谓“不知如何下笔”，对柯劭忞劝其注《尚书》则谓“较《谷梁》有生发”，反映了王国维对这两部经书的不同看法。王国维长期从事古史研究，在《尚书》考证与研究方面论著甚多，成就卓著^⑩；手校《尚书》至少有四种，即《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尚书王氏注》二卷、通志堂刻本《书古文训》十六卷、嘉庆九年宁俭堂刻本《尚书隶古定释文》、钞本《尚书骈枝》一卷^⑪，并撰成《古本尚书孔氏传汇

①《致徐乃昌（一九二三年六月八日）》，《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97页。

②如5月7日、6月7日致罗振玉函（《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44、547页），6月8日致徐乃昌函（第597页），7月1日致王文烜函（第601—602页），7月22日、7月26日、8月14日、8月15、8月16日致马衡函（第811—815页）等等。

③《观堂别集》卷四第十二叶。标题拟作“魏石经考自序”。

④《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49页。

⑤《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27页。

⑥牟润孙：《柯凤荪先生遗著三种》，载牟润孙《海遗丛稿（初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271页。

⑦牟润孙：《柯凤荪先生遗著三种》，载牟润孙《海遗丛稿（初编）》，第271页。

⑧近年评论该书的专文，有文廷海《柯劭忞春秋谷梁学特色研究》，《求索》2015年第2期。

⑨近年又影印入《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二辑（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⑩洪国梁：《王国维之经史学》，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

⑪赵万里：《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载《赵万里文集》第一卷，第71页。

校》,“据敦煌所出《隶古定尚书》与日本古写本校今本”^①,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七种隶古定本《尚书》“汇为一编”^②。他认为,《尚书》各篇中,“其伪者亦魏晋间人搜辑古逸书所成,其言多有裨于政治道德,不可废也;其真者多纪帝王行事及君臣论治之语,实中国三千年来政治道德之渊源,亦中国最古之史也”^③,从经学角度(“政治道德”)肯定其价值。其后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期间,也曾讲授《尚书》,学生记录的讲稿有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刘盼遂《观堂学书记》等^④。对《春秋谷梁传》则不甚重视,《经学概论》讲义仅以短短五十字略述其兴亡过程,而未加任何评述^⑤。不过,王国维毕竟没有接受柯劭忞的建议,去为《尚书》作注。

其五,此函又谓“近来颇思学《易》,拟专读经文,不作他种交涉”。王国维称《周易》为儒家“专学”、“内学”^⑥,将《周易》的主体内容概括为“阴阳消长之理”,认为“圣人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作此书,以为人事之准绳”^⑦。他曾手校《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周易》十卷^⑧,并撰有《宋抚州本〈周易〉跋》(1922年5月作)等,对其做过文献学的研究,但没有撰写过理论阐发性质的著作^⑨。北上任职于清廷之后,王国维提出“颇思学《易》”,且“专读经文,不作他种交涉”,显然并非从文献考订角度着眼,而是立意从义理角度“明人事”。这一设想,或许与他当时的见闻与感触有关。详情如何,仍有待发掘更多资料,才能展开探讨。

综上,这通信札内容涉及王国维1923年北上之初的行事、交游、见闻与著作,可补充现有多种年谱、评传,对王国维研究不无裨益,有一定史料价值;尤其是“谈胸臆”与涉及学术思想部分,为王国维思想发展历程的探讨提示了可能的新角度,值得注意。

本文承柳向春、方韬、王亮、赵爱学等友人指教,多有是正,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刘波,男,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文献整理、图书馆事业史。

①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载《赵万里文集》第一卷,第69页。

②赵万里:《静安先生遗著选跋》,载《赵万里文集》第一卷,第97页。

③王国维:《经学概论》,载《王国维全集》第6卷,第316页。此讲义撰于1925年9月(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436页)。

④前者原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后者原载《国学论丛》第2卷第2号(1930年);收入《王国维全集》第20卷《附录》,第26—65、80—128页。

⑤王国维:《经学概论》,载《王国维全集》第6卷,第320页。

⑥王国维:《经学概论》,载《王国维全集》第6卷,第311页。

⑦王国维:《经学概论》,载《王国维全集》第6卷,第314—315页。

⑧赵万里:《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载《赵万里文集》第一卷,第71页。

⑨彭华:《王国维与〈周易〉研究》,《周易研究》2014年第5期。

西屏華兄大人同叩由身居客室一函
 計述
 台覽馬邊軍事左呈已送至核桃坪
 已得十二之七再有一二勝仗勇人必將乞
 援此時正宜示以兵威牛次令就兵呈李
 副將管帶親兵二百名赴左呈山周
 道潤道以資後以策應并予以保兵壯
 我於機右在左兵力較單刻宜防其回
 撲者是以擊左呈兵力并令以候祖
 雲節直在左并親兵三百名在右呈
 助以此調度刻期了以事惟此等係
 以打之左右呈為心若再深入因兵固在
 後然以此地不足以為利亦不為必以保
 派兵矣再述計是為至要之者耳特未

丁宝桢致周倬亮函（局部）

详参薛以伟《〈丁文诚公致先太守手札〉考释》一文

孟姊吾兄有道別後忽、兩月比想
 起居勝常為頌此間夏令而不甚熱未於五月遷入後丁藏樂
 局新居家巷未未屋多人少於銷夏於宜
 暑中無可消遣頗作金石題跋近三四日因成興名往讀書一養
 緣今歲所出觀石佳合諸幾石小片共得二千字許比宋人所見乃
 踰倍也才在此處酬謝雖此間可深考據學者首王君可為談胸
 臆者則謝承恩和湯衡也
 丁酉春日丁元公為
 元來此道大學士半年事全不
 可知瑞元亦不易命篤也陸上諸公不甚知此間情形以通書
 則書不勝書而陸之恒喜以書佳觀又不多生是非故雖不敢
 直書於諸老然中上月却有一文字極西方學術教一之害并現在
 自處之道中間甚費周折乃得上達亦聊盡寸心不敢言有所補
 益然不敢以告陸上諸公也
 楊常暗風走道注教還不知以下等二物中注尚書此却教教
 無有主發也近來研學易觀自讀經文不作他種文涉
 先謂有自來書
 苦瓜大和尚
 道安

王国维致张尔田函

详参刘波《王国维致张尔田函考释》一文